

文化认同、现代经验与叙述主义

——2011年蒙古语诗歌的关键词

□满全(蒙古族)

对于蒙古语诗歌创作来说，2011年是一种特殊年份，有探索、有反思，也有焦虑和期待。诗歌是蒙古族文学中的重要体裁，诗歌可以说是蒙古族全民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。

从作者、文本、艺术探索方面看，文化认同、现代经验、叙述主义是2011年蒙古语诗歌的三个主题词。

文化认同：诗人共同体

身份来自于文化体系。当下世界政治、经济格局中，文化认同是蒙古族诗人共同体重要纽带。老、中、青三代诗人，从不同立场、不同视角进行诗歌创作，讴歌时代主旋律、反映社会生活，反思人生、宇宙、万物的关系，谱写着艺术传奇。这个时代，诗歌越来越担当起了医疗的、宗教的功能。

虽然每个诗人感悟世界、把握世界、书写世界的方式、视角不同，每个人的诗歌观念、审美追求、艺术风格不同，但是他们所遇到的问题、关注的现实是相同的。因此，诗人之间自然而然形成了共同的追求、共同的话语和共同的价值标准。换言之，三代诗人的精神纽带尚未隔断，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而诸多诗人共同关注的则是文化生存。因为，文化具有强烈的收编功能和凝聚民众情感的能力，并向特定方向引导。

从2011年的蒙古语诗歌创作看，文化认同成为了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。诗人们以不同视角、不同风格的文本表达了对民族文化关注和思考。民族文化、传统文化、土著文化自然成为了2011年诗人们备受关注的诗歌话语和诗歌主题。如老一辈诗人阿尔泰的《寻找成吉思汗》、勒·敖斯尔的《八骏颂》、苏尤格的《八骏之歌》等作品，以不同视角书写成吉思汗和八骏，讴歌了永不破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。众所周知，成吉思汗和八骏是富有文化气息的精神密码，代表着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。在现实的困境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下，重构民族文化自信，唤起民众的文化认同，诗歌担当着重要角色。文化主义、共同体和地域(故乡)是相互关联的话语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，在蒙古族文坛上相继出现了文化小说、文化诗歌和文化散文，受到民族读者的青睐和好评。

现代经验：复杂与骚动

书写现代人的生活方式、生存困惑、内心世界的作品，在2011年蒙古语诗歌中占据着重要比例。社会转型、文化变迁、现实困境，逐渐冲击着现代人的精神堡垒、价值体系、道德规范和审美追求，一切仿佛

在被重新设计、从头再来的过程中。求变，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标签。因此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蒙古语诗歌着力表现复杂、不安、骚动的现代人的社会心理，记录着时代变迁。蒙古族正在经历着社会现代化、文化变迁的转型时期。

诗歌是生命的密码、社会的敏感神经。现代人的现代经验，在不同诗人笔下有不同的表现。如特·思沁的《诗歌的微笑》一诗，是探索宇宙之源、万物之缘、人生真谛的作品。无限的联想、自由的跳跃、另类的表达方式，让读者深思冥想。特·思沁是富有探索精神的先锋诗人，他追求的是熟悉世界的陌生化表现。从这意义看，特·思沁不是抄写世界的诗人，而是发现世界、创造世界的诗人，他寻找着宇宙万物的内在联系。道日那腾格里的《东京，不相信诗人的谎言》一诗，描写了文化碰撞中的大都市生活，抒发了现代人的复杂、不安情绪。通篇跌宕起伏、气势磅礴，内容庞杂、氛围浓重，表现了诗人对宇宙、人类、文化、生命的独特理解和深刻的反思。作品有厚度，有宽度，也有穿透力，是近几年蒙古语诗坛上出现的一篇力作。海日塞的《草原深处的盛夏》一诗，以精练的语言、深刻的思想、浓郁的情感，塑造了完美的艺术世界。该诗虽然书写草原深处的盛夏，但诗人思考的是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。以不同方式发现世界、书写现代经验成为了他近几年的诗歌追求。宝音巴图的《晚点的火车》一诗，以冷漠的叙述方式，展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。晚点的火车，隐喻了现代人的现实迷茫。诗人在冰冷的氛围中叙述了现代人的焦虑、迷茫、不安以及无止境的等待，一切不在原有的规定和期待中出现，相反，一切在无规则、无章法中延续着、存在着。人世間没有承诺，也没有可循的真理，现代人都是等待玄妙的人。

现代经验，以复杂、不安、骚动、冰冷甚至荒诞、灰暗为特征，有别于前工业社会的人生经验。随着社会、历史、文化变迁，蒙古语诗歌审美客体正发生着变化，即从传统社会经验的书写向现代社会经验的书写转变，从田园牧歌的抒情向都市喧嚣的叙述转变，从简单、温馨、舒缓的审美品格向复杂、多变、冰冷的审美品格转变。

叙述主义：一种可能

在抒情诗中如何处理现代经验，如何运用新的叙述手法，是当下蒙古语诗歌创作的两条探索路径。蒙古语诗歌中叙述主义的盛行，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和现代经验的书写有关。

其实诗歌是抒情类文学，抒情是它的基本表现手

法。但在诗歌中要表现复杂、不安、骚动、冰冷甚至荒诞、灰暗的现代经验，抒情手法的确力不从心，很难完成。另一方面，能用抒情方式表达出来的平和、舒缓、温馨、优雅的心情，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所剩无几。综观2011年的蒙古语诗歌创作，以叙述方式，或者冷抒情方式，书写现代经验的作品不少。如乌顺包都嘎的《从死亡般的睡梦中醒来》一诗，以议论、叙述手法，书写了人世间消极、冷漠、灰暗的一面，表达了现代人的复杂经验。该诗放弃了抒情，选择了议论和叙述。齐·那顺达来的《乡村小路》一诗，也放弃了抒情，运用叙述手法，以描写乡村小路的过去与现在，展现了传统与现代、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冲突带来的种种变化。抒情诗中的叙述有别于英雄史诗和小说中的叙述。前者属于内部世界的叙述，后者为外部世界的叙述。

当下蒙古语诗歌创作中有三种表现手法，即抒情手法、议论手法和叙述手法。三种手法与诗歌中描写的情、思、境有关。如抒情主义是遵循情感的逻辑、规则、特点来书写世界，这类诗歌中抒情是基本的表现手法，诗人追求的是情感的抒发。议论主义是遵循思想的逻辑、规则和特点来书写世界，这类诗歌中议论是基本的表现手法，诗人追求的是思想的表达。叙述主义是遵循现实的逻辑、规则和特点来书写世界，这类诗歌中叙述是基本的表现手法，诗人追求的是现实的展现。但是某个作品中混合运用抒情、议论和叙述手法的现象居多。韦勒克、沃伦在其《文学理论》中，把诗人分为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，所谓主观诗人就指抒情诗人，推崇抒情主义的诗人；所谓客观诗人就指叙述诗人，推崇叙述主义的诗人。叙述主义，虽然为诗歌内容的扩展、张力以及处理现代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，但是损毁了诗歌的崇高性、音乐性和情感色彩。

回顾2011年的蒙古语诗歌创作，可以说成绩斐然，力作诸多，乡村写作、都市写作共存共荣，特别是网络诗歌的异军突起，给民间话语权以及新民间文学的崛起提供了一种可能。



成功的金科玉律

——读《穆斯林之子》

□高深(回族)

我没想到张桂芝写纪实文学，也没想到她写了一位成功的商家，更没想到这部书的主人公竟是一位回族。最早她说写了一本书，让我为这书写篇序文，我多少有一点犹豫。但是当我了解了这三个“没想到”以后，便欣然答应了。

我用两天多的时间读完了20多万字，一直沉浸在感动与兴奋之中。读罢，我在电话里对桂芝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谢谢你，桂芝！”作为一个回族人，我感激时代造就了一位成功的回族商家，他的成功证实了我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，是一个勇于拼搏并敢为人先的有创新意识的民族。我也感激桂芝熬费颐养天年的时日，为表现一个人的命运与真实人生，表现一个人从小商小贩起步一跃为著名回族企业家的艰辛历程，为此，她做了深入的访问，掌握了主人公一生及商海中起步创业成功的生动素材，熟悉了很多穆斯林的习俗与生活用语，应该说，她也成功地撰写了一部具有时代意义和民族特色的传记文学。

“士农工商，买卖为纲”，“七十二行，商是桥梁”。这部书的主人公林长景是很多公司的经理，但在他一长串的头衔中，他总是把“中共党员”放在最前面，我见过许多名片，却极少见过对个人身份、职务如此排列的。张桂芝说：“共产党员”是他心目中最光荣最神圣的头衔，他认为没有第一个头衔，就不

可能有后面那一长串头衔。仔细想一想，这里面确实有着深刻的道理。

我一页页翻阅书稿，企图找到林长景是怎样从一个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的商贩，发展成今天这样规模化的企业群。作者是很智慧的，她写了林长景所以成功的诸多因素，例如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；林长景敢闯、敢“第一个吃螃蟹”、敢于担当风险的勇气；在困难重重、不乏陷阱的商海之中，他那股不服输不气馁不放弃的韧劲……这些都是当年“下海人”共同具有的气质，没有上述这几点，他们就不可能扔掉“铁饭碗”去奔波闯荡。张桂芝独具慧眼，以不厌其烦的笔墨写了林长景两个字的“生意经”，即是“诚”与“信”。所谓成功的金科玉律，概而言之，不外“德义”与“诚信”两端；而单从商业领域而言，“诚信不欺”又在商家伦理与商业道德中处于中心位置。

从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中，就能看出一个商家做人 and 经商 的德性。“锦一顺炸鸡”是辽西的名牌食品，在多个食品博览会上拿过大奖，声名远播。炸鸡的生意很火，可是利润却微薄，有时几乎是“赔本赚吆喝”。炸鸡不

我一口气读完了云南大理州祥云县白族作者李树华的长篇小说《漂泊缅甸的日子》。这部20万字的小说作为祥云作家丛书第二辑10本书中的一本，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2011年8月出版。作者的大伯李颢生，即小说主人公吴温吞，在新中国建立前走夷方到缅甸谋生，先后经历了走老银厂、缅甸国有化运动、参加缅共、缅共投降中央政府等重大事件，后来定居缅甸八莫。他长期来往于缅甸、泰国和中国之间，为发展中缅友谊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，至今在缅甸八莫和不甸白族地区还有一定的影响。《漂泊缅甸的日子》依据李颢生的真实人生，以第一人称“我”，讲述了以吴温吞为主的那些祥云人走夷方的各自传奇经历。

祥云人的走夷方，近似华北穷苦百姓闯关东到东北三省谋生的一种生活出路。祥云人走夷方，是一直走出国境，在缅甸漂泊、挣扎、奋斗。《漂泊缅甸的日子》，写出了各自在缅甸漂泊的际遇。小说描绘了缅甸的地理环境并展示了那里的异国风情，写了缅甸的老虎、猴子、大象、寺庙、玉石、和尚、美女、罂粟，当然也写了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和在缅甸经商的外国人。

这是一本一看见书名便想看看它的内容的书。它首先吸引了那些其父辈有过走夷方



新年伊始，一套精美的书籍——《石一宁自选集》(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)摆上了我的案头。淡雅大方的装帧把我引进了色彩斑斓而又充满书卷气息的内文之中。这套自选集分为评论卷《走向文学新天地》与散文随笔卷《湖神回来了》，反映了壮族作家评论家石一宁写作生涯的一个侧面。细细品读，深深感到这部自选集，是对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独具视角与个性的见证。

在此之前，曾经读过石一宁的一些叙事与抒情散文，深沉细腻，浏亮通畅，几乎篇篇都是一个美的世界，但展示的不是华艳浮躁的美，而是看似信手拈来、不着痕迹的美的呈现。文如其人，自然平易，真诚坦荡。他的作品，远离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，是思想的涵蓄，也是性情的流露，因此为读者所倾心。

石一宁曾多年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工作，从作家作品的评论到对当代文艺创作诸多现象的研究，他都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。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，观察视角、思维方式、文笔手法各不相同，然而二者又互动交融、相辅相成。石一宁是作家与批评家兼而得之。作为文学创作者，他有理论家逻辑思维深刻性。作为文学批评者，有着形象思维的宝贵体验，不仅成就了自己，也让不少写作者深深受益。他是用心血浇灌着自己的作品，两卷自选集作品正是他多年来心血的结晶。

散文随笔卷《湖神回来了》充满诗意的书名，是对全书既流畅诗情，又充盈理趣的风格特色的极好概括。其中一部分内容，反映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，作者走访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大家，将见闻与感触成文，将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，展示给读者。作者所写的这些文艺名家颇有代表性，在某种程度上映现出新时期文艺艺苑的一个侧影。文如其人，书如其名，在浮躁的当下生活中，读一读这样的散文随笔，是美感的享受，性灵的洗涤。

评论卷《走向文学新天地》辑录了作者对新时期以来多位作家作品的评析。无论是享誉文坛的大家，还是初出茅庐的新秀，他们都以一个文坛同道者的真诚，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，娓娓道来，人情入理，剖析精辟。从不虚意奉承，更不恣意棒杀。或正面铺陈，或横斜逸出，褒贬宽严适度，行文从容不迫，真知灼见动人心弦。这是其文学评论的特色。

这本自选集两卷50多万字，只是从作者创作与评论作品中筛选出的一部分，这也体现了作者坚守精益求精、质量至上的高标准和对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。这种精神让人可以期待在未来的岁月中，继续读到作者更多的锦绣篇章。

——读《石一宁自选集》

□俞杰



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，似乎正被铺天盖地的时尚和新潮所席卷。当人们过度依赖于网络、微博和影像，一味沉浸于高技术、快节奏、高效率的时候，以诗歌为精神内核和重要表征的文学艺术，看似越来越边缘化，被世俗世界遗弃了。然而，一个成熟的社会，必然要在其革新的阵痛中，历经原有文化系统的结构整合与分化，必然要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以及文化创造的过程中，展开对人类精神特质空间的深层追问与探寻——人作为精神存在的境界与道悟、信念与情感，将成为调节社会公众与个体生命交融及自我生长的一剂良方，在不断前行中发掘出回归本源的价值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诗歌的被边缘化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。边缘化，恰恰是诗歌存在的一种气质和状态。诗歌本来就不该在社会视野的中心，不该在世俗喧嚣的旋涡里，附和某些所谓的思想主题，表达某些物化的欲念。诗歌，是构成社会文化基石的精神底线，是生命个体精神旅途中的抒怀，是人的精神向往与心灵归宿。

当我读到侗族诗人吴基伟的诗集《踏歌行》时，更加坚信了这个判断的合理性。基伟出生在贵州天柱县一个偏僻的侗族山村，1994年大学毕业后，从三线企业的一名钳工干起，经过十多年基层企业管理岗位的历练，最后调任重要岗位，丰富的履历和突出的业绩促成了他人生轨迹的跃升。在我与吴基伟的接触中，我常常强烈地感受到他与生俱来的诗性与真挚，感受到他超凡脱俗的那一面。尽管他的工作性质很繁琐，他也十分投入那份肩负责任与使命的事业，但他的生命中好像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文学，没有离开过审美的视界。

吴基伟曾向朋友们讲述，他的家乡是个只有40多户人家的村寨，很早以来家家户户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，几乎每家都培养出了大学生。他们村子里，过年时每家门口的春联内容都是自家编撰的，并且常常是家中的小春联写的，虽然写得有点歪歪扭扭，却别有一番趣味。那时每到春节，走村串户拜年的时候，父母就会让他拿个小本本，抄写各家春联的内容，回家后再细细品读比较，看谁家的

编得精妙。我们侗族常有“诗的家乡、歌的海洋”之美誉，基伟从小的经历，充分印证了侗族文化的精髓是浸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深入侗人血脉的。因此作为诗人的基伟，是一个从出生便被故土滋养、为文学做了相当多准备的人，这种准备既是无意识的，又是他后天专注和用心的必然因果，使他练就了一种把握日常生活细节、传达灵动审美诗意、张扬生命永恒寓意 的能力。

在我的阅读中，对基伟《踏歌行》里印象最深刻的作品，当属《旅途》：“为了更好地仰望/我决定向冬天学习/从习惯丰收到静于耕耘/从置张回到涵养/从醉心观赏到愉悦寻找/如同那只鸚鸟抓住天空的蔚蓝/掠过雨季浑浊的狂野/和天地自然一起成长”……诗行之间，有种精神的内在在传递，他的“仰望”从选择冬天开始，“丰收”是基于“耕耘”的付出，是回到“涵养”的“寻找”。他把自己喻作“鸚鸟”，在天地、自然、和旷野间飞翔，为的是抓住天空中的“蔚蓝”，其实这何尝不是自己生命中的精神渴望？

写诗的吴基伟，对这个世界有种与众不同的洞察力。“我把一只眼，精心/做成瞄准的姿势/看你，在树与树的守望中/舒展菩提的静默”(《观寺》)，从中我们可依循看到他 对人生思考的哲学深度与文化厚度；“虽然所有生机，还有希望/都远在天不可及的梦境里/枝头的欢娱和盎然绿意/已不再喧闹拥挤/我还是敬仰你飘落的翅迹”(《春眠》)，这些娴熟精湛的诗句，反映了他的诗歌风格中具有探险的特色，他期望以一种“飘落的翅迹”的方式，描绘万物之“生机”，探索虚幻的象征、真实的存在中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。

某种意义上，一首好诗 的完成，必须首先基于自我情感世界的深刻体验，基于社会、文化视角的深刻感悟。在此基础上，诗人自发的、不由自主的潜在意识，在知识不断积淀的过程中，按照审美的原则重新感知并定义自我及世界，并内化为人的精神旅途的一部分，这时，诗人对事物的独到发现，就会转化为对诗学系统的整体把握。吴基伟的许多短诗，就较好地完成了这种转换。“在纯粹的民风面前/在侗寨悠远的安排面前/在和諧的天地面前/岁月早了，思念就是失火”(《思念》)，这样的体验与隐喻，在基伟的意识中，“晨风”知道，“鸡鸣”知道，“溪水”也知道；“流淌在血脉里的民族基因/漫过八百里侗乡/那抹苍翠那片云彩那江碧波/夜夜入梦”(《侗寨》)，对吴基伟而言，故乡始终是他创作冲动和生命存在的永恒背景，他的精神游历中，永远与自己的故土保持着割舍不断的情感联系。

吴基伟的诗歌，不装腔作势，不做空泛的抒情，注重将自然之美与人性之美熔铸于一体，通过自己的艺术敏感和诗性诉求，使其诗文本呈现出丰富的面貌，读来令人动容。比如一首《江畔》，将一位游子的那种惆怅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：“那个夜晚/湘江拥我入怀/……/奔跑的月光里 我的心/重又植入故乡泥土的芬芳”；而在《秋语》中，他用撼动人心的述说，反射着人生事务与自然去中的复杂性，蕴涵着许多无法言尽的话外之意：“脚下，草丛又一次列队/开始一季不慌不忙的撤退/而在高处，更高处/树梢让出天空，飞鸟/落在了缤纷的心里，惊起一阵风，一次一次/把我抱紧，我听见/那些无比空灵的声音/将无边无际的春天/淹没了”。

当然，吴基伟的人生诗性和精神向往，是永远不会被淹没的。因此，他“把心交给读者”(巴金语)，用诗歌解剖自我、审视人生，他的生命轨迹注定深深地打上了美的烙印，在精神的旅途中用真挚抒写和完善生长的诗篇。

有修改空间的好书

——读白族作家李树华长篇小说《漂泊缅甸的日子》

□普飞(彝族)

说中导致记事的堆砌，削弱了人物形象，也妨碍了情节顺利发展。

三人谈对这部小说得失的分析，我也有同样感觉。我与他们三人稍有不同的看法是：三人都认为作者能够写出这样一部长篇，是由于他获得了一个优势题材。我却认为这题材给了作者一个恩格斯说的“典型环境”中有这个典型环境，就要像恩格斯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样，应当努力塑造吴温吞这个主要人物的性格，让其形象活灵活现又顶天立地的站立起来。

作者对吴温吞的原型李颢生很熟悉，对缅甸历史的现代的知识也很丰富，如果《漂泊缅甸的日子》有机会再版的话，作者是有能力把作品改好的。明知作品有缺陷却因为作者生活积累不足而感到无法修改，那才是可悲的。有修改空间的书就是一本好书。

思想的涵蓄与性灵的洗涤